



大会

Distr.: General
19 July 2021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七十六届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 75(b)

促进和保护人权：人权问题，包括增进
人权和基本自由切实享受的各种途径

人权与国际团结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长谨向大会转交人权与国际团结独立专家奥比奥拉·希内杜·奥卡福尔
依照人权理事会第 [44/11](#) 号决议提交的报告。**

* [A/76/150](#)。

** 独立专家感谢约克大学和内桑森跨国人权、犯罪和安全中心协助编写本报告。



人权与国际团结独立专家奥比奥拉·希内杜·奥卡福尔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是人权与国际团结独立专家奥比奥拉·希内杜·奥卡福尔先生为大会编写的第四份报告。在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44/11](#) 号决议提交的报告中，独立专家审查了在经济安全和不安全的背景下表达国际团结以更充分地实现人权的作用。经济保障的有无与个人和民族追求体面生活水平、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能力和过上有尊严生活的权利内在地交织在一起。

一. 导言

1. 在本报告中,人权与国际团结独立专家奥比奥拉·希内杜·奥卡福尔考查了在经济安全和不安全的背景下表达国际团结以更充分实现人权的作用。经济安全的有无与个人和民族追求体面生活水平、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能力和过上有尊严生活的权利内在交织在一起。¹ 在当今时代,分析国际团结在促进经济安全、从而在改善经济不安全方面的作用至关重要,因为当今时代的特点是全球化、² 供应链相互关联、³ 生产中越来越多地采用技术以及相应地取代传统劳动模式。⁴ 最近时期的经济不安全也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包括油价暴跌⁵ 和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分享经济的增长推动⁶ 的不稳定就业的增加⁷。此外,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使许多人没有足够的收入来源,至少在短期内找到稳定和有保障的工作的前景有限。⁸ 这些事件发生的背景是,国际贸易体制内的贸易紧张局势和不确定性加剧,这增加了压力,引发了各国和私人行为者不可预测的反应。⁹ 在这一关键时刻,局势使个人和民族处于脆弱的境地,这对他们的经济安全产生了负面影响,不适当地限制了他们享有人权、特别是《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¹ Amartya Sen, “Capability and well-being”, in *The Quality of Life*, Martha Nussbaum and Amartya Sen, ed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30; Amartya Sen, *Development as Freedom*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99); Martha C. Nussbaum, *Women and Human Development*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and Martha C. Nussbaum and Amartya Sen, eds., *The Quality of Life* (Oxford, United Kingdom, and New York, Clarendon Press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² Joseph E.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W.W. Norton, 2003); and Benedict Oramah and Richman Dzene, “Globalization and the recent trade wars: linkages and lessons”, *Global Policy*, vol. 10, No. 3 (September 2019), pp. 401–404.

³ Gary Gereffi, “Global value chains in a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 world”,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21, No. 1 (2014), pp. 9–37.

⁴ Pablo Falco and Andrea Salvatori, “How technology and globalization are transforming the labour market”, in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Employment Outlook 2017* (Paris, 2017).

⁵ Atif Kubursi, “Oil crash explained: how are negative oil prices even possible?”, *The Conversation*, 20 April 2020.

⁶ Alexandra J. Ravenelle, *Hustle and Gig: Struggling and Surviving in the Sharing Economy* (Oakland,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9); and Koen Frenken and Juliet Schor, “Putting the sharing economy into perspective”, in *A Research Agenda for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Governance*, Elgar Research Agendas, Oksana Mont, ed. (Cheltenham, United Kingdom, and Northampton, Massachusetts,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9).

⁷ Guy Standing, “The precariat”, *Contexts*, vol. 13, No. 4 (Fall 2014), pp. 10–12.

⁸ 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应对 COVID-19 危机经济社会影响政策框架”,政策简报,2020 年 5 月; Rene Pana-Cryan and others, “Economic security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a healthy work design and well-being perspectiv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Science blog, 22 June 2020; 另见 [A/HRC/44/40](#)。

⁹ Bernard Hoekman, “Trade wars and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causes, consequences, and change”, *Asian Economic Policy Review*, vol. 15, No. 1 (January 2020), pp. 98–114.

所载的人权(第二条第(一)款和第十一条第(一)至第(三)款),¹⁰ 例如适当生活水准权(《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三条第(三)款和第二十五条)和工作权利,这对确保人格固有尊严至关重要(《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六至第七条)。

二. 在展现国际团结以实现人权的背景下理解经济安全

A. 界定经济安全

2. 经济安全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有三个宽泛的维度。首先,可以从以国家为中心的国家安全角度来理解这一点,这个角度强调各国试图保护本国经济不受其他国家决定和活动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追求经济安全与减少对其他国家的过度经济依赖息息相关。¹¹

3. 从第二个角度来看,在资本国际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日益复杂的世界中,各国的经济安全在决定个人和民族的经济安全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本报告中,除了在各国的经济安全对分析民族和个人的经济安全发挥重要作用的情况外,不会加以详细探讨。

4. 第三,在本报告使用的意义上,经济安全可以更宽泛地在“人的安全”范畴内加以理解。¹² 从这个角度来看,经济安全的定义有多种方式。¹³ 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将经济安全描述为“由基本社会保障组成,其定义是获得与健康、教育、居住、信息和社会保障有关的基本需求基础设施的机会,以及与工作相关的保障”。¹⁴ 经济安全也可以被定义为“个人不受造成困境的经济损失的程度”。¹⁵ “当感知到的风险超过了他们以不会造成困境的方式适应或缓冲这些风险的预期能力时”,则家庭认为自己不再安全。¹⁶

¹⁰ 另见《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二条;和 [A/75/148](#)。

¹¹ Miles Kahler, “Economic security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definition and provision”,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7, No. 4 (2004), pp. 485–502.

¹²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1994 年人类发展报告》(2004 年,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第 23 页。该报告彻底改变了一般的安观,从以国家为中心转变为以民族为中心。经济安全被确定为人的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¹³ George E. Rejda, *Social Insurance and Economic Security* (Armonk, New York, M.E. Sharpe, 2012), p. 4; Guy Standing, “Economic insecurity and global casualization: threat or promise?”,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vol. 88, No. 1 (August 2008), pp. 15–30; 劳工组织,《经济保障促成更美好的世界》(2004 年,日内瓦)。

¹⁴ 劳工组织社会经济安全方案,“定义:我们所说的‘经济安全’是什么意思”(2004 年);劳工组织,《经济保障促成更美好的世界》。

¹⁵ Jacob S. Hacker and others, “The Economic Security Index: a new measure for research and policy analysis”,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vol. 60, No. S1 (May 2014), pp. S5–S32 (p. S6).

¹⁶ Jacob S. Hacker, Philipp Rehm and Mark Schlesinger, “The insecure American: economic experiences, financial worries, and policy attitude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11, No. 1 (March 2013), pp. 23–49 (p. 25).

5. 导致经济安全的因素既有外部因素，也有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可能是对个人或民族的经济稳定有直接影响的冲击。这些外部冲击可能是局部的，比如失业和疾病，也可能是全球性的，比如全球经济衰退、全球金融危机、油价暴跌或前所未有的全球事件，如当前的 COVID-19 大流行。然而，仅有外部冲击并不会造成经济不安全。¹⁷ 若要使经济不安全存在，这些外部冲击必须与另一个因素叠加——没有能力保护自己不受冲击或能力有限——在一个社会安全系统提供的保护有限甚至没有保护的生态系统中经受这种冲击，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这种冲击。因此，经济安全的内部层面至关重要，因为相关的外部冲击可能会给一些人(如穷人)带来经济不安全，但对另一些人(如富人)则不会，这取决于其能否以不会造成困境的方式缓冲这些冲击。

6. 虽然贫困往往与经济不安全相关，但它们并不是同义词，¹⁸ 因为即使没有贫困，经济不安全也可能存在。经济不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以无法规划生活和未来为前提的不确定性和缺乏安全带来的重创和无力感。当人们有了“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时，就存在经济安全，¹⁹ 因而有可能虽然生活不贫困，却生活在对匮乏的恐惧中。²⁰ 此外，虽然解决狭义贫困问题必须仍然是所有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的重要全球和国家目标，但经济安全包括更广泛的一系列目标，包括减少就业不足和确保粮食安全。²¹

B. 受经济不安全影响的个人和民族

7. 尽管任何人都可能受到上述外部冲击的影响，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因此而在经济上变得不安全。因此，处于脆弱境地的个人和民族更容易变得经济不安全。在具体的经济不安全背景下处于脆弱境地的人可包括妇女(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就业不稳定的人、²² 残疾人、老年人、移民、难民、少数群体和土著社区。例如，由于各种问题，妇女往往受到经济不安全的重大影响，包括她们从事无偿劳动、被剥夺财产权、性别工资差异以及工作场所的歧视和性别歧视。²³ 另一个例子是，

¹⁷ 同上。

¹⁸ 劳工组织，《经济保障促成更美好的世界》；Siew Mun Tang, “Rethinking economic security in a globalized world”, *Contemporary Politics*, vol. 20, No. 1 (2015), pp. 40–52 (p. 42).

¹⁹ 见《世界人权宣言》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序言。

²⁰ Tang, “Rethinking economic security in a globalized world”, p. 42.

²¹ 同上。

²² Standing, “The precariat”.

²³ Canada, House of Commons, *Women’s Economic Security: Securing the Future of Canada’s Economy – Report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n the Status of Women* (2018); and Natasha Cortis and Jane Bullen, *Domestic Violence and Women’s Economic Security: Building Australia’s Capacity for Prevention and Redress – Final Report* (Sydney, Australia’s National Research Organization for Women’s Safety, 2016).

被迫流离失所者也特别容易受到经济不安全的影响，因为他们往往无法获得稳定的就业或金融服务、信贷和工具。²⁴

8. 此外，“民族”一词含义内包含的某些被种族化的族裔群体和土著社区往往特别容易受到经济不安全的影响。²⁵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一条第(一)款和第二十五条)和《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七条第(一)至第(三)款)承认“所有民族”自由处置其自然财富和资源的经济权利以及其生活资料不被剥夺的权利。具体地说，“民族”一词包括土著和少数民族社区，他们享有经济安全与其土地和资源的使用密不可分。²⁶ 确保这些族裔群体和土著民族的经济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他们享有土地保有权的保障。²⁷

9. 经济不安全也对全球南方的个人和民族造成不成比例的影响，那里获得社会安全网的机会有限，大量经济活动发生在非正规经济中，这在许多情况下涉及不能称为体面的工作。²⁸ 全球南方许多国家的财政能力不足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况，这些国家负债累累，在偿债方面的支出超过了关键的社会福利。²⁹

C. 国际团结对经济安全的重要性

10. 迫切需要国际团结来解决经济不安全问题，因为与经济不安全有关的因果关系往往超越国界，在大多数情况下，导致所涉经济不安全情况发生的刺激因素是地方性的还是全球性的，是无关紧要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解释说：

²⁴ Karen Jacobsen, “The economic security of refugees: social capital, remittances, and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in *Global Migration: Challenge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Kavita R. Khory, e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pp. 65–66.

²⁵ Trina Jones, “Occupying America: Dr. Martin Luther King, Jr., the American dream, and the challenge of socio-economic inequality”, *Villanova Law Review*, vol. 57, No. 2 (2012), pp. 339–356; Paul Attewell, Philip Kasinitz and Kathleen Dunn, “Black Canadians and black Americans: racial income inequalit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 33, No. 3 (2010), pp. 473–495; and Francis Markham and Nicholas Biddle, *Income, Poverty and Inequality*, Centre for Aboriginal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2016 Census Paper, No. 2 (Canberra, 2018).

²⁶ 美洲人权法院，卡利尼亚和洛科诺民族诉苏里南案，判决书，2015年11月25日，第138–139段；另见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少数群体权利发展中心(肯尼亚)和少数群体权利国际组织代表恩多罗伊斯人福利理事会诉肯尼亚，第276/2003号文件，2010年2月4日；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少数群体权利发展中心、少数群体权利国际和奥杰克民族发展方案(代表奥杰克社区)诉肯尼亚共和国，第381/09号来文。

²⁷ 经合组织，“土地对土著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载于《将土著社区与加拿大的区域发展联系起来》，经合组织农村政策审查(2020年)。

²⁸ Ellen Ehmke, “Introduction: State responses to insecurity”, in *Socio-Economic Insecurity in Emerging Economies: Building New Spaces*, Khayaat Fakier and Ellen Ehmke, eds. (Abingdon, United Kingdom, Routledge, 2014).

²⁹ Boileau Loko 等人，“国外负债对低收入国家贫困的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工作文件，第WP/03/61号(2003年，基金组织)。

人的安全的各个组成部分是相互依存的。当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民族安全受到威胁时，所有国家都可能卷入。饥荒、疾病、污染、贩毒、恐怖主义、种族争端和社会解体不再是局限在国家边界内的孤立事件。其后果蔓延全球。³⁰

11. 世界各地的人们继续适应全球化、互联互通的市场、共享经济的兴起、工业生产自动化导致的就业岗位流失以及 COVID-19 大流行的影响。所有这些因素都表明，全球人民的经济地位岌岌可危，经济安全程度有限。这些事件还凸显了经济不安全对世界各地人权的享受可能产生的深刻负面影响。虽然在一个相互关联的世界中，经济问题往往由各国在国家内部管理，但从国际团结的角度来看，处理导致经济不安全的刺激因素和经济不安全本身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采用协调一致的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并在实现人权方面带来好处。

12. 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缺乏经济安全往往会使机会主义行为、极端主义和绝望情绪持续存在，从而产生跨越国界的外溢效应。这一点表现在，缺乏和追求经济安全而不仅仅是贫困，是非正常移民的一个重要原因。它还助长了多个国家的反动民粹主义倾向，特别是那些认为自身安全、稳定和有保障的工作因国际贸易而被其他国家民族“偷走”的人。³¹ 非正常移民、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是全球性问题，部分原因是经济不安全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国内问题。所有这些反过来又对人权的享受产生了重要的负面影响。

13. 因此，至关重要的是，在将经济安全与否作为一个国际团结问题来讨论并采取行动方面做更多的工作，而不是在很大程度上将其置于国家关切的领域。可以而且应该利用国际团结来防止或限制经济冲击的影响及其对人权的负面影响，并使个人和民族有能力应对这种冲击并从中恢复，同时对其生活产生积极的人权影响。

三. 保障国际团结，以根据国际人权法实现经济安全

14. 经济安全保障牢牢植根于《国际人权宪章》，特别是《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世界人权宣言》，以及《联合国宪章》，所有这些都强调需要国际合作来改善经济安全。根据《联合国宪章》，联合国的宗旨之一是需要开展国际合作，除其他外，改善经济安全(第一条第三项)，而合作是国际团结的一个重要方面(见 [A/HRC/35/35](#)，附件)。还应指出，个人和民族可获得的经济保障水平与其享有基本人权的能力直接相关，包括享有适当生活水准权、工作权和社会保障权。这一论点在以下分节中展开论述，这些分节涉及《世界人权宣言》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规定的经济安全保障。

³⁰ 开发署，《1994 年人类发展报告》，第 3 和 22 页。

³¹ Nicolas Lamp, “How should we think about the winners and losers from globalization? Three narrativ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he redesign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greement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30, No. 4 (November 2019), pp. 1359–1397.

A. 《世界人权宣言》

15. 《世界人权宣言》为几项权利奠定了基础，这些权利直接决定着经济安全存在与否。第二十二条规定：

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并有权享受他的个人尊严和人格的自由发展所必需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各种权利的实现，这种实现是通过国家努力和国际合作并依照各国的组织和资源情况。

16. 这确立了国家努力和国际合作都需要保障社会安全，这有助于提供经济安全，实现经济和社会权利，充分享有这些权利对于人的尊严和提高人的能力至关重要。这些经济和社会权利包括工作权(第二十三条第(一)款)、有权享受使其有一个符合人的尊严的生活条件的公正和合适的报酬(第二十三条第(二)款)和适当生活水准权，包括获得食物、衣物、住房、医疗和社会服务的权利(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享有这些权利受到国际人权法的保障，即使是在失业、疾病、残废、丧偶、衰老和其他个人无法控制的情况等外部诱发的冲击或事件期间也是如此。³² 《宣言》第二十二条保障了社会保障权，并将通过国家努力和国际合作来实现。此外，《宣言》还保障受教育权(第二十六条)，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缺乏教育和无法在快速发展的全球经济中提高技能是世界各地许多人经历的经济不安全度的一个关键促成因素。

B.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17. 同样重要的是，在缺乏经济安全的情况下，《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所载经济和社会权利的实现受到威胁。首先，《公约》(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享有适当生活水准权，包括适当的食物、衣着、住房和不断改善生活条件的权利，无法在经济不安全持续存在的情况下有意义地实现。同样，有意义地实现这些权利以及其他权利，如工作权(第六条)和享有提供体面生活水平的有利工作条件的权利(第七条(子)款第(二)项)，也受到经济不安全的威胁，例如限制人们找到有酬职业能力状况和不稳定就业，这两种情况今天在世界各地都相当普遍。³³ 此外，《公约》承认每个人都有权获得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第九条；另见 [A/HRC/45/15](#)，第 56 段和 [A/75/167](#)，第 39 段)。社会保险是经济冲击和出现经济不安全之间的屏障，因此是保护人们的经济和社会权利不受剥夺或更多侵犯的途径之一。

18. 为保障这些权利的实现，《公约》第二条第(一)款明确规定：

本公约缔约国承允尽其资源能力所及，各自并藉国际协助与合作、特别在经济与技术方面之协助与合作、采取种种步骤，务期以所有适当方法，尤其包括通过立法措施，逐渐使本公约所确认之各种权利完全实现。

19. 此外，《公约》认识到国际合作在实现适当生活水准权方面的重要性(第十一条第(一)款)，并强调了这种合作在确保人人享有免于饥饿的权利方面的作用(第十一条第(二)款)。

³² Rejda, *Social Insurance and Economic Security*.

³³ Standing, "The precariat".

C. 其他人权文书

20. 对经济安全的保障也可以在其他一些人权文书中找到, 尽管有时表达得较为含蓄。《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禁止种族歧视, 这一因素显然阻碍了世界许多国家的少数族裔享有经济和社会权利(第五条(辰)款)。³⁴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除其他外, 承认世界各地妇女均享有工作保障、社会保障、自由选择职业和就业的权利以及她们的工作权(第十一条)。《公约》还认识到, 必须采取适当措施, 确保其适用于农村妇女, 因为她们在家庭经济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第十四条)。《儿童权利公约》则责成缔约国在可能的情况下向残疾儿童的父母提供援助, 同时考虑到父母或其他照料人的财政资源(第 23 条), 并协助父母和其他负责照顾儿童的人落实每个儿童均有权享有足以促进其生理、心理、精神、道德和社会发展的生活水平(第 27 条)。

21. 至关重要的是, 《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保护在没有正当程序的情况下移徙工人不被任意剥夺财产的权利, 不论个人所有或与他人共有(第 15 条)。移徙工人在工作报酬和其他工作条件方面, 应享有不低于适用于就业国国民的待遇(第 25 条; 另见 A/HRC/39/51 第 17 段和 A/75/148 第 39-41 段), 他们有权在就业国享受社会保障, 只要他们符合可享受给予国民的同等待遇的所有条件。对于没有适用立法允许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从社会保障中受益的情况, 各国应审查移民报酬的选择, 并按照类似情况下就业国国民应享有的福利对待他们(第 27 条)。移民将其储蓄和收益转移给家人的权利也得到保障(第 47 条)。

22. 《残疾人权利公约》还保护残疾人的工作权, 除其他外, 禁止在就业、职业发展和健康工作条件方面基于残疾的歧视(第 27 条第(1)款)。《公约》还承认残疾人享有适当生活水准的权利, 并禁止基于残疾的歧视(第 28 条)。

23. 值得一提的是, 《宪章》第五十五和五十六条规定, 为实现所有人权, 包括那些保障经济安全的人权, 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均负有开展国际合作的法律义务。还值得再次强调的是, 国际合作是国际团结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

四. 积极展现国际团结, 促进在经济安全的背景下更充分地实现人权

24. 多年来, 为解决经济不安全及其对享受人权的负面影响提出了几项建议。其中一些措施包括引入普遍基本收入、³⁵ 社会保障最低标准³⁶ 和现金转移支付计划。³⁷ 然而, 这些并不是解决经济不安全问题的唯一途径。经济不安全也可以通过政府支

³⁴ 关于对种族歧视和经济机会的探讨, 见 Lincoln Quillian and others, “Do some countries discriminate more than others? Evidence from 97 field experiment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in hiring”, *Sociological Science*, vol. 6 (June 2019), pp. 467–496。

³⁵ Louise Haagh, *The Case for Universal Basic Income* (Medford, Massachusetts, Polity Press, 2019)。

³⁶ 开发署、劳工组织和全球南南发展研究院, 《分享创新经验: 社会保障最低标准成功经验》, 第 18 卷(2011 年, 纽约)。

³⁷ Guy Standing, “How cash transfers promote the case for basic income”, *Basic Income Studies*, vol. 3, No. 1 (April 2008), p. 11.

持的保险计划、住房计划、退休和养老金办法、培训多技能的可及教育，以及关于金融知识和储蓄的信息和培训来解决。³⁸ 关于经济安全的研究、教育和宣传也促进了所有人的经济安全。³⁹ 从本质上讲，任何减少或消除带来不安全的环境对个人和民族的影响的计划，或使他们有能力更好地应对外部冲击的计划，都有助于加强经济安全。

25. 本节从两个主要方面讨论国际团结在经济安全与经济不安全方面的积极表现。本节首先探讨旨在解决经济不安全问题的倡议的不完全清单，其次探讨各国、国际组织和多方联盟在这方面国际团结的一些积极表现。

A. 旨在解决经济不安全问题 and 实现特定人权的团结倡议

普遍基本收入方案

26. 普遍基本收入是指在无须经济证明的情况下，定期和无条件地向一个国家内的所有个人发放现金，有时被称为基本收入、公民收入或公民基本收入。⁴⁰ 基本收入被认为是一种有望帮助消除经济不安全的方式，其支持者认为，基本收入可以减少经济上最脆弱者的贫困，管理成本低，不容易出错，不会带来耻辱，因为不论是否需要，人人都有。⁴¹ 随着全球经济性质的演变，普遍基本收入被视为一个机会，可以“打造一种更具包容性的、适合当代的社会契约”。⁴²

27. 目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实行了普遍基本收入。然而，有几个旨在探索其可行性的试点计划。这些努力包括由政府、研究机构、组织和捐赠者共同设计和赞助的研究。GiveDirectly 全民基本收入实验是一个耗资 3 000 万美元的项目，覆盖了生活在肯尼亚农村 197 个社区的 2 万人。这是关于普遍基本收入影响的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实验，由公共和私营部门行为者合作资助，包括美国国际开发署、谷歌、全球创新基金和 GiveWell。⁴³ 该实验旨在探索普遍基本收入能否改善经济、健康、社会和宏观经济福祉。这项为期 12 年的研究始于 2017 年，COVID-19 大流行疫情虽属不幸，但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可以评估该项目在可能引发经济不安全的不可预见的外部冲击背景下的影响。⁴⁴ 对该计划的初步分析表明，根据饥饿、疾病、抑郁和就诊等参数，人们的幸福感有所改善。⁴⁵

³⁸ 劳工组织，《为了更美好世界的经济保障》。

³⁹ 同上，第 47 页。

⁴⁰ 见 <https://basicincome.org/about-basic-income>。

⁴¹ 同上；另见 A/HRC/31/60，第 66 段。

⁴² Ugo Gentilini and others, eds., *Exploring Universal Basic Income: A Guide to Navigating Concepts, Evidence, and Practice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20).

⁴³ 见 www.givedirectly.org/funders-and-partners。

⁴⁴ Abhijit Banerjee and others, “Effects of a universal basic income during the pandemic”, September 2020.

⁴⁵ 同上。

28. 斯坦福基本收入实验室是另一个提供全球普遍基本收入实验的信息和数据的合作倡议，是汇集全球所有基本收入实验的中心。⁴⁶ 该计划由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基金会、贾恩家庭研究所、经济安全项目和麦考伊家庭社会伦理中心资助。⁴⁷

29. 这些项目在各国、世界地缘政治区和政府/非政府组织轴心之间的协作性质及其在初步结果中的积极影响表明，它们是国际团结的积极表现，可以解决对世界各地享有人权产生负面影响的各种经济不安全问题。

30. 尽管如此，对基本收入的批评甚嚣尘上，有人认为，基本收入计划降低了工作动力。⁴⁸ 此外，基本收入需要各国的预算拨款支出，这使人怀疑这些国家是否有能力承担由此带来的财政义务。⁴⁹

31. 一些国家也进行了自己的基本收入试验，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包括芬兰政府 2017-2018 年的普遍基本收入试验、美利坚合众国阿拉斯加永久基金(已运作 30 多年)和科威特的埃米里赠款方案。⁵⁰ 然而，只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蒙古的基本收入方案符合真正的基本收入计划的特点，因为它们是有保障的、以现金为基础的、普遍的、由国家提供的、全国范围的和频繁提供的。⁵¹ 2009 年 1 月至 12 月，纳米比亚政府的基本收入赠款项目⁵² 向奥吉维罗-奥米塔拉社区 60 岁(有资格领取政府养老金的年龄)以下的 930 名居民提供了 100 美元，是世界上第一个普遍基本收入试点方案。⁵³ 该项目记录了该社区的贫困率大幅下降，自方案开始以来，没有增加人口的家庭贫困率从 76% 降至 16%，有迁入记录的家庭贫困率降至 36%。⁵⁴ 经济活动也增加了 10% 以上，儿童营养不良和教育方面的结果有所改善，犯罪率总体下降。⁵⁵

⁴⁶ 见 <https://basicincome.stanford.edu/experiments-map>。

⁴⁷ Stanford Basic Income Lab, Global Map of Basic Income Experiments database, 可查阅 <https://basicincome.stanford.edu/research/basic-income-experiments>。

⁴⁸ Gentilini and others, *Exploring Universal Basic Income*, p. 100.

⁴⁹ 同上。

⁵⁰ 同上。

⁵¹ 关于基本收入举措的详细一览表，见同上，第 22 页。

⁵² Claudia Haarmann and others, *Making the Difference! The BIG in Namibia: Basic Income Grant Pilot Project Assessment Report, April 2009* (Windhoek, Namibia, Namibia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Forum, 2009); and Claudia Haarmann and others, *Towards a Basic Income Grant for All: Basic Income Grant Pilot Project Assessment Report, September 2008* (Windhoek, Namibia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Forum, 2008).

⁵³ 同上。

⁵⁴ 同上。

⁵⁵ 同上。

32. 随着 COVID-19 大流行和各国出台刺激计划，有关基本收入的对话可能已经启动，特别是在加拿大等国对基本收入的呼声日益高涨的情况下。⁵⁶ 实施基本收入的这些合作性和基于国家的努力为其他国家的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制定能够更好地实现预期效果的类似计划的工具。

社会保障最低标准

33. 根据劳工组织的资料，世界上超过一半的人口缺乏社会保障，而社会保障是经济安全的关键驱动力。⁵⁷ 劳工组织提出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倡议，作为联合国应对 2007-2008 年经济危机的九项联合倡议之一。⁵⁸ 社会保障最低标准是国家制定的一套基本社会保障措施，目的是切实提供保护，通过预防或减轻生命周期内的贫困、脆弱性和社会排斥，加强经济安全。⁵⁹ 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倡议倡导提供现金或实物转移，以确保人民获得有保障的最低收入，并能获得生活必需品和社会服务。该倡议还主张根据本国的优先次序为弱势群体提供收入保障。⁶⁰

34. 社会保障最低标准符合社会公正、社会保障权和人民享有足以维持健康和福祉的生活水准权这些基本原则。⁶¹ 社会保障最低标准提供了基本保护，有可能避免高度的经济不安全，因而可以维持(以权利为基础的)发展和经济安全的良性循环。与其他基于需要的社会支助概念不同，社会保障最低标准采用的是基于权利的方法。⁶² 虽然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倡议承认在实施社会保障最低标准方面有一定的斟酌余地，但建议还是应将这种最低标准纳入现有的扩大社会保障国家战略。⁶³

35. 因此，各国可以考虑具体的体制结构、经济制约、政治态势和社会期望，自由地采取不同办法来实施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倡议，但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应被理解为迈向更高保障的第一步。⁶⁴ 由于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施，因此可以进行创新，并适应当地情况。⁶⁵

⁵⁶ Sejla Rizvic, “The COVID-19 pandemic shows us what universal basic income could look like in Canada”, Institute for Canadian Citizenship, 25 August 2020.

⁵⁷ 劳工组织，《普及社会保障促进人类尊严、社会正义和可持续发展》(2019 年，日内瓦)。

⁵⁸ Fabio Bertranou, “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倡议”，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危机的说明，2010 年。

⁵⁹ 见 www.ilo.org/secsoc/areas-of-work/policy-development-and-applied-research/social-protection-floor/lang--en/index.htm；以及劳工组织，《实行社会保障最低标准促进公平包容的全球化——米歇尔·巴切莱特主持的咨询小组(由劳工组织与世卫组织合作召集)的报告》(2011 年，日内瓦)。另见 A/HRC/44/40 第 36-39 段，A/HRC/31/60 第 66 段，A/HRC/36/40 第 62 段，以及 A/HRC/47/36 第 10-14 段。

⁶⁰ 劳工组织，《实行社会保障最低标准促进公平包容的全球化》。

⁶¹ 同上。

⁶² 同上。另见《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二和二十五条)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九、十一和十二条)所载社会保障权。

⁶³ 劳工组织，《普及社会保障促进人类尊严》。

⁶⁴ 劳工组织，《实行社会保障最低标准促进公平包容的全球化》。

⁶⁵ 开发署、劳工组织和全球南南发展研究院，《分享创新经验》。

36. 有几个社会保障最低标准方案的例子可供其他国家效仿，包括多民族玻利维亚国的免缴款普遍养恤金方案——尊严养恤金，每月向 60 岁以上的公民支付普遍终身养恤金。⁶⁶ 在印度，圣雄甘地全国农村就业保障计划保证每个农村家庭每年有 100 天的就业时间，总共惠及 5 200 多万户家庭。⁶⁷ 阿根廷家庭普遍儿童津贴为非正规经济工作者、失业者和未向既定计划缴款的人的子女提供现金转移和基本服务。⁶⁸ 巴西的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倡议——家庭补助金有条件现金转移方案，规定接受现金转移取决于儿童的健康和教育结果，例如儿童登记入学和遵守接种时限。⁶⁹ 南非家计调查型现金转移方案——儿童抚养补助金，被称为政府最成功的减贫方案之一。⁷⁰ 中国也推出了民众健康保险，并推行了农村养老试点计划，目标是到 2020 年支助超过 7 亿农村人口。⁷¹

现金转移

37. 现金转移是另一种可以更充分地实现经济安全从而实现特定人权的方法。与无条件的普遍基本收入不同，现金转移可以有条件也可以无条件，可作为紧急和发展援助发挥作用。埃塞俄比亚的现金转移方案就是一个例子，该方案旨在向作物歉收的家庭提供财务救济。⁷² 而无条件的现金转移在形式上更接近普遍基本收入。⁷³

38. 在世界各地，各国政府根据不同的资格要求推出了现金转移方案，以缓冲 COVID-19 疫情引发的经济冲击对本国公民的影响。例如，为应对疫情，加拿大政府推出了加拿大应急福利，每月为符合特定资格标准的人提供 2 000 加元福利金。⁷⁴ 尽管现金转移传统上被认为不如更健全的社会保障方案有效，但鉴于疫情爆发，有关现金转移方案潜力的讨论似乎已大幅增加。⁷⁵

实施社会与团结经济

39. 社会与团结经济运动所包含的是那些在生产 and 交换货物及服务的同时追求明确社会目标的组织和企业(包括合作社、互惠社、协会、社区储蓄和贷款计划、自

⁶⁶ 同上，第 47 页。

⁶⁷ 同上，第 271 页。

⁶⁸ 同上，第 25 页。

⁶⁹ Janine Berg, “巴西应对危机的有条件转移支付——家庭补助金方案”，劳工组织关于危机的说明，2009 年。

⁷⁰ 开发署、劳工组织和全球南南发展研究院，《分享创新经验》，第 363 页。

⁷¹ 劳工组织，《实行社会保障最低标准促进公平包容的全球化》。

⁷² Standing, “How cash transfers promote the case for basic income”, p. 11.

⁷³ Evelyn L. Forget, Alexander Peden and Stephenson Strobel, “Cash transfers, basic income and community building”, *Social Inclusion*, vol. 1, No. 2 (2013), pp. 84–91; 另见 A/75/167 第 51 段和 A/HRC/47/36 第 10-11 段。

⁷⁴ Ugo Gentilini, “A game changer for social protection? Six reflections on COVID-19 and the future of cash transfers”, World Bank blogs, 11 January 2021.

⁷⁵ 同上。

助团体、基金会和社会企业)。⁷⁶ 社会与团结经济依赖于合作、团结、伦理和民主自我管理,以公平、平等和社会保障为核心驱动力。⁷⁷ 社会与团结经济的组织和企业将社会目标置于获取最大利润之上,以求增强处于不利地位的弱势社会成员的权能。⁷⁸ 这场运动被视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⁷⁹ 菲律宾、大韩民国和南非等国出现了社会与团结经济的组织和企业,如自助团体、合作社以及与政府的协作计划。⁸⁰

B. 积极展现国际团结以解决经济不安全问题, 帮助实现人权

40. 经济不安全的影响,包括对特定人权的享有的负面影响,往往超越国界。由于认识到这一点,一些国际和地方行为体积极合作解决这一问题。

国家

41. 国家仍然是在国内和国际上努力保障所有人经济安全的主要角色,不过只限于各国不同的能力范围内,而且往往需要团结合作。例如,加拿大在这方面通过多种方式展现国际团结,包括部署方案支持加拿大境内难民的经济安全。⁸¹ 这种支持形式多样,包括向符合条件的难民提供临时住房和最长一年的每月收入补助,提供心理健康支持和新来者就业方案。⁸² 这些服务往往是根据重新安置援助方案与服务提供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和信仰组织合作提供的。⁸³

42. 瑞士国家经济事务秘书处⁸⁴ 开展了几项国际团结合作活动,旨在加强其他国家的经济安全,进而促进特定人权,包括最近捐赠 8.79 亿瑞士法郎补充国际开发协会和非洲开发基金的现有资源,以消除贫困、促进可持续发展和解决 COVID-19 危机。⁸⁵

43. 澳大利亚、挪威、俄罗斯联邦、瑞典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与世界银行合作,为快速社会响应方案多捐助者信托基金提供资金,以帮助全球各国建

⁷⁶ Peter Utting, *Public Policies for Social and Solidarity Economy: Assessing Progress in Seven Countries* (Geneva, ILO, 2017).

⁷⁷ 同上。

⁷⁸ 同上。

⁷⁹ Ilcheong Yi 等,“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 社会与团结经济发挥什么作用?”,联合国社会与团结经济机构间工作队会议纪要,2019 年 6 月,日内瓦。

⁸⁰ 同上。

⁸¹ 见 www.cic.gc.ca/english/helpcentre/answer.asp?qnum=098&top=11。

⁸² 同上。

⁸³ 见 www.canada.ca/en/immigration-refugees-citizenship/services/refugees/help-within-canada/government-assisted-refugee-program/providers.html。

⁸⁴ Switzerland, Federal Council, “Switzerland supports the development banks in reducing poverty and overcoming crises”, 27 May 2020.

⁸⁵ 同上。

立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该信托基金已在亚洲、中东和非洲执行了多个项目。⁸⁶ 其运作的前提是，世界越来越容易受到气候、经济 and 冲突等各种冲击，因而需要各国政府为家庭提供支助，以减轻此类事件的影响。⁸⁷ 该信托基金为科特迪瓦和尼泊尔的项目提供了支持。⁸⁸

44. 除财政援助外，思想领导在展现国际团结以解决经济不安全及其对世界各地许多人权的负面影响方面也很重要。通过研究和彻底了解经济不安全造成的问题而产生的思想领导力将极大地促进制定更有效的全球解决方案。关于经济安全 and 经济不安全问题的合作研究，例如促成劳工组织经济安全报告的研究(由荷兰政府通过与劳工组织的伙伴关系以及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赠款提供支持)，⁸⁹ 有助于了解与经济安全 and 经济不安全有关的紧迫问题，并提供工具，帮助决策者制定可行的方案，改善人民的经济安全。

45. 技术能力建设是各国展现国际团结以促进经济安全、进而促进人权的另一种手段。尼日利亚技术援助团方案始于 1987 年，体现了这一领域的南南合作。⁹⁰ 通过该方案，尼日利亚医学、法律、护理和农业等各个领域可以帮助加强经济安全的熟练专业人员，自愿部署到参与该方案的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尼日利亚政府部署这些人员是为了支持参与国的增长和发展。⁹¹ 同样，古巴历来向各国派遣医疗志愿人员，作为国际团结行动帮助加强这些国家的经济安全。⁹²

46. 由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的合作社发展方案支持农业、金融、卫生、能源和信息技术领域的合作社并与其建立合作伙伴关系。⁹³ 例如，相关项目包括与秘鲁的三个可可合作社建立伙伴关系，以提高生产率和收成质量，此前由于产品质量较低而导致国际需求减少。这些合作社生产率提高了 100%，赚取了 500 万美元的额外收益，从而加强了合作社成员的经济安全。⁹⁴

国际组织

47. 劳工组织等国际组织在认识到经济安全多层面性质的同时，一直处于促进经济安全进而促进人权的前列，并在汇集这方面的知识和研究以及执行政策方面发

⁸⁶ 见 www.worldbank.org/en/programs/rapid-social-response-program。

⁸⁷ 世界银行，“快速社会响应方案：建立适应型社会保障制度以保护贫穷和弱势群体”，2020 年。

⁸⁸ 同上。

⁸⁹ 劳工组织，《经济安全促成更美好的世界》。

⁹⁰ Wale Adebawo, “Government-led service: the example of the Nigerian Technical Aid Corps”, *Voluntary Action*, vol. 7, No. 2 (Summer/Autumn 2005).

⁹¹ 同上。

⁹² Pol De Vos and others, “Cuba’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health: an overvi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s*, vol. 37, No. 4 (October 2007), pp. 761–776; 另见 [A/HRC/38/40/Add.1](#)。

⁹³ 见 www.usaid.gov/local-faith-and-transformative-partnerships/cooperative-development-program。

⁹⁴ 同上。

挥了领导作用。⁹⁵ 《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劳动世界的未来百年宣言》确认了因全球经济变化而需要处理的几个当务之急。这些当务之急包括确保弱势群体受到保护、消除强迫劳动和童工、推动所有人享有体面工作、帮助非正规劳动者过渡到正规经济以及关注农村地区。⁹⁶ 劳工组织还强调受冲突、灾难和其他人道主义紧急情况影响的人享有体面工作的重要性。⁹⁷

48. 劳工组织支持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倡议，一直在提供关于执行该倡议的信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劳工组织和全球南南发展研究院合作编写的《分享创新经验》报告第 18 卷汇总了几个社会保障最低标准的经验，并为对类似倡议感兴趣的国家提供一个平台，从在全球南方 15 个国家进行的关于社会保障最低标准政策的 18 个案例研究中学学习。⁹⁸ 这是这一领域国际团结的积极、模范表现。

49. 除了普遍基本收入和社会保障最低标准等促进经济安全的传统建议外，劳工组织还认识到，了解经济选择和认识金融体系也有助于经济安全，进而有助于更充分地实现人权。⁹⁹ 该组织推出了一项社会金融方案，研究如何利用金融体系促进体面工作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以保证“更多、更好、更合适的工作”，¹⁰⁰ 所有这些都将有助于经济安全。2019 年，该方案重点关注致力于金融普惠的银行、小额金融机构和信用社、从事影响保险的保险机构以及开展可持续投资的投资者。¹⁰¹

50. 通过社会金融倡议，劳工组织与津巴布韦储备银行及津巴布韦初等和中等教育部合作，就金融教育概念对 100 名教师进行了培训。这样做是因为，了解和使用金融工具的教师可以教会其学生更多的金融知识，进而这些学生就可以做出改善自己经济状况的决定。劳工组织还与阿根廷社会发展部和国家小额信贷委员会合作，制定了一项金融教育方案。¹⁰² 还曾就类似的金融普惠方案为科特迪瓦、吉尔吉斯斯坦、毛里塔尼亚、塞拉利昂和突尼斯提供咨询。¹⁰³

多方努力

51. 还部署了其他几种类型的国际合作努力，以改善经济安全。通过改善企业家获金融服务机会以促进小微企业的倡议是劳工组织与瑞士国家经济事务秘书处

⁹⁵ 开发署、劳工组织和全球南南发展研究院，《分享创新经验》。

⁹⁶ 《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劳动世界的未来百年宣言》，2019 年；另见 [A/HRC/39/51](#)，第 17 段。

⁹⁷ 同上。

⁹⁸ 开发署、劳工组织和全球南南发展研究院，《分享创新经验》。

⁹⁹ 劳工组织，《2019 年社会金融年度报告》(2020 年，日内瓦)。

¹⁰⁰ 同上。

¹⁰¹ 同上。

¹⁰² 同上。

¹⁰³ 同上。

合作制定的一个三年期方案。其目的是促进可持续、负责任的金融普惠，帮助微型企业和小企业。¹⁰⁴

52. 对于朝不保夕的人来说，只要发生一次健康问题，就会陷入经济不安全状态，有时还会陷入贫困，这种情况并不少见。这就是为什么加纳国家健康保险机构在 2017 年与劳工组织影响保险机制及法国开发署合作，启动了一个项目，使人们能在手机上续签数字医疗保险，从而消除人们获得健康保险的障碍。¹⁰⁵

53. 妇女世界信贷会是一个非政府组织，由 28 个国家的 51 家机构组成联盟，致力于向低收入妇女提供金融服务。¹⁰⁶ 它们侧重于确保金融服务提供者满足妇女的需求，并通过培训和创新金融产品实现这一目标。核心资助者包括澳大利亚政府、威士基金会和瑞典国际开发合作署。妇女世界信贷会在多个国家支持帮助妇女获得金融普惠的项目。¹⁰⁷ 该组织还通过其资本合作基金倡导进行性别视角投资，这是一家私募有限合伙企业，投资于专注女性的金融机构。¹⁰⁸ 这是共同行动的一个例子，不仅解决了一般的金融普惠问题，还解决了与妇女有关的金融普惠问题，与妇女有关的金融普惠是一个经济安全问题。

54. 其他旨在加强经济安全的多方倡议包括改善收容社区和被迫流离失所者前景的伙伴关系，这是一项 9 400 万欧元的倡议，得到荷兰外交部的支持，由国际金融公司、劳工组织、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银行实施。该方案将从 2019 年持续到 2023 年，旨在确保流离失所群体获得经济机会。¹⁰⁹ 其目标是共同重新构想各利益攸关方、包括社会合作伙伴和私营部门如何应对被迫流离失所危机。¹¹⁰ 其他慈善组织，如基本收入地球网络，通过提供关于基本收入的教育来支持对经济安全的探索。¹¹¹

五. 可能对特定人权的享有产生负面影响的经济安全方面的国际团结差距

55. 尽管有在经济安全方面积极展现出国际团结的例子，但在这一领域仍然存在重大的国际团结差距。

¹⁰⁴ 同上。

¹⁰⁵ Aparna Dalal, Lisa Morgan and Shilpi Nanda,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Agency, Ghana”, case brief, May 2019.

¹⁰⁶ 见 www.womensworldbanking.org/about-us。

¹⁰⁷ 见 www.womensworldbanking.org/insights-and-impact/page_category/country-strategies-2019。

¹⁰⁸ 见 www.womensworldbanking.org/gender-lens-investing。

¹⁰⁹ 见 www.ilo.org/global/programmes-and-projects/prospects/WCMS_725066/lang--en/index.htm。

¹¹⁰ 同上。

¹¹¹ 见 <https://basicincome.org/about-basic-income>。

A. 贸易政策与国家福利分离

56. 对新自由主义贸易政策的批评越来越多，而且往往是合理批评。¹¹² 民粹主义情绪和经济民族主义的高涨，也与人们对当前这种全球贸易体系对世界大部分地区普通人生活的影响的不满情绪有关。虽然有人声称，在全球范围内，自由化的贸易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做大了“经济蛋糕”，但蛋糕的公平分配却是另一回事。¹¹³ 无论如何，这块蛋糕肯定没有公平分享。¹¹⁴ 贸易政策的实施通常会产生赢家和输家，甚至整个社会都是输家。全球贸易政策极少公平地惠及所有受影响的各方。¹¹⁵

57. 国际贸易的收益集中在特定的人手中(通常是在全球北方和在全球南方国家的某些经济精英群体中)，但在经济上处于弱势的贸易自由化的输家往往要么几乎得不到补偿，要么只能在国家一级得到补偿。¹¹⁶ 这一情况似乎已被国际社会大多数行为体认为是正常情况。即使在新的国际贸易协定之后推出了有助于缓解这种情况的国家贸易调整援助方案，这些方案也往往是临时性的，需要重新谈判和重新授权，而且没有保障。¹¹⁷ 与此同时，导致必须实行此类援助计划的国际贸易协定却很少重新谈判。

58. 此外，许多国家没有国家贸易援助方案，因而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即它们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收益往往只被一部分人掌握，而输家只能自求多福，导致经济不安全状况严重加剧。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把所有福利问题交由市场力量或国家福利计划，往往并不能产生公平或可取的结果，因此，人们现在更加关注由此造成的不平等加剧现象。¹¹⁸ 要保障经济安全，需要在国际层面具体考虑对国际贸易和社会福利之间相对普遍的二分法进行评估，并采取果断行动。

B. 特定群体和民众经济安全的阻碍

59. 有一些障碍限制了某些群体，如妇女和生活在全球南方者的经济安全。例如，尽管全球南方的几个国家严重依赖海外汇款来满足其大量公民的基本需求，但向这些国家汇款的成本很高，特别是在非洲。世界银行估计，汇款费用平均为转账

¹¹² Jackie Smith, “Globalizing resistance: the battle of Seattle and the future of social movements”, *Mobilization: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vol. 6, No. 1 (March 2001), pp. 1–19; and Clyde Summers, “The battle in Seattle: free trade, labor rights, and societal value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 22, No. 1 (2000–2001), pp. 61–90.

¹¹³ Harlan Grant Cohen, “What is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for?”,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13, No. 2 (April 2009), pp. 326–346.

¹¹⁴ Lamp, “How should we think about the winners and losers from globalization?”.

¹¹⁵ Michael J. Trebilcock, *Advanced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2nd ed. (Cheltenham, United Kingdo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5).

¹¹⁶ Cohen, “What is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for?”.

¹¹⁷ Timothy Meyer, “Misaligned lawmaking”, *Vanderbilt Law Review*, vol. 73, No. 1 (2020), pp. 151–221.

¹¹⁸ Cohen, “What is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for?”.

金额的 6.75%，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平均汇款费用为 8.47%。¹¹⁹ 这导致寄往这些国家的汇款所能提供的经济安全程度相应降低。

60. 经济安全的另一个障碍是失业保险计算忽略了在非正规经济部门工作或者属于低收入家庭的人。¹²⁰ 妇女也面临经济安全方面的障碍，包括性别工资差异、¹²¹ 限制参与某些经济活动和职业¹²² 以及性暴力和性别暴力，这些因素可能会限制她们追求高等教育，削弱她们的工作能力，使她们容易受到健康问题的影响。¹²³

C. 市场失灵、监管缺失和经济不安全

61. 虽然全球化被积极评价为“具有净正面意义”，但全球互联互通市场的不利之处在于难以对这些相互关联的实体进行国家监管，从而导致监管漏洞，暴露出全球经济的弱点。过度相信市场自动调节以及监管方面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 2007-2008 年的金融危机。¹²⁴ 随着全球经济的演变，特别是由于共享经济和全球价值链增加而导致的演变，必须制定创新的监管办法，使之与全球经济活动对地方经济的潜在和实际负面影响(其中一些经济体受到的影响比其他更严重)相称。人们更多地尝试将商业和人权结合起来(见 [A/HRC/17/31](#)，附件)，并鼓动建立可持续、合乎道德的供应链，这些都是这方面积极但还不够充分的进展。¹²⁵

D. 沉重的债务

62. 重债国家，特别是本就贫穷的国家，为其人民提供适当生活水准的能力往往相当有限。因此，这些国家在承担沉重的债务负担之前必须更加谨慎，必须随时为全球南方的这些国家提供债务减免(其中许多国家已经耗费国家预算的很大一部分来偿还现有债务)。¹²⁶ 如果贷款没有用于合法目的，便会产生双重危险，因为借债国的公民没有获得债务可能为其带来的好处，但偿还义务却又给借债国带来沉重的负担。¹²⁷ 世界银行重债穷国倡议和多边减债倡议等债务减免计划可以为负债国减轻少量债务负担。¹²⁸

¹¹⁹ 世界银行，《全球汇款价格》，第 35 期(2020 年 9 月)。

¹²⁰ 劳工组织，《经济安全促成更美好的世界》，第 123 页。

¹²¹ Canada, House of Commons, *Women's Economic Security*.

¹²² 世界银行，《2020 年妇女、企业与法律》(2020 年，华盛顿特区)。

¹²³ Canada, House of Commons, *Women's Economic Security*.

¹²⁴ Adrian Blundell-Wignall, Paul Atkinson and Se Hoon Lee, “The current financial crisis: causes and policy issues”, *Financial Market Trends*, No. 95 (December 2008).

¹²⁵ Genevieve LeBaron, Jane Lister and Peter Dauvergne, “Governing global supply chain sustainability through the ethical audit regime”, *Globalizations*, vol. 14, No. 6 (2017), pp. 958–975.

¹²⁶ Loko and others, “The impact of external indebtedness”; 另见 [A/HRC/46/29](#)，第 48 段。

¹²⁷ João Tovar Jalles, “The impact of democracy and corruption on the debt-growth relationship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vol. 36, No. 4 (December 2011), pp. 41–72.

¹²⁸ 世界银行，《重债穷国倡议和多边减债倡议：最新统计》，基金组织政策文件(2019 年，华盛顿特区)。

E. 土著人民的经济安全

63. 土著人民的经济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开发其土地的能力。¹²⁹ 那些试图破坏土著人民获得和使用其土地的活动大大增加了他们丧失经济安全或面临更严重的经济不安全的可能性。¹³⁰ 考虑到偏见往往会限制土著人民在其现今所属国家更广泛的社会中取得进步的能力，他们往往比大多数其他群体处于更不稳定的境地。¹³¹

64. 除被殖民剥夺土地权之外，土著人民常常不得不提起大量诉讼才能使其人权得到承认。¹³² 诉讼通常是一个昂贵的过程，这还不包括其他难以量化的情感成本。即使做出了对土著人民有利的判决，他们也往往不得不为执行这些裁决而斗争，在一些情况下，这样的诉讼要耗时数年。¹³³ 然而，在此期间，土著人民的财产权却继续遭受侵犯。¹³⁴

65. 尽管国际社会通过《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见大会第 61/295 号决议附件)等文书以及其他区域文书和机制越来越多地承认土著人民的权利，但这些侵权行为仍有发生。尤其是，《宣言》第 10 条规定，如果未事先获得土著人民的自由知情同意和给予公正公平的赔偿，并在可能时提供返回的选择，不得强迫土著人民迁离其土地或领土。

六. 结论和建议

66. 经济安全 and 经济不安全是当今的关键问题，经济安全存在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世界各地的个人和民族是否能够享有许多人权。全球经济互联互通的性质使得根本不足以在国家范围内大体处理经济安全问题。要解决世界各地某些个人和民族面临的严重经济不安全，需要更大程度的国际团结，包括由此开展的合作。

67. 根据上述分析，独立专家建议各国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考虑以下建议，以加强全球经济安全，进而促进更充分地享有人权：

(a) 各国应在其规划、预算和执行政策中提高经济安全的优先地位。在政策实施之前，应认真思考政府政策对某些(传统)弱势群体经济安全的影响；

¹²⁹ 经合组织，“土地对土著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¹³⁰ 同上。

¹³¹ Donna J. MacIsaac and Harry Anthony Patrinos, “Labour market discrimination against indigenous people in Peru”,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32, No. 2 (1995–1996), pp. 218–233.

¹³² 美洲人权法院，卡利尼亚和洛科诺人民诉苏里南案；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少数群体权利发展中心(肯尼亚)和少数群体权利国际代表恩多罗斯人福利理事会诉肯尼亚；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少数群体权利发展中心、少数群体权利国际和奥杰克人民发展方案(代表奥杰克社区)诉肯尼亚共和国。

¹³³ 开放社会基金会，“战略诉讼的影响：土著人民的土地权”(2017 年，纽约)。

¹³⁴ 同上。

(b) 各国和各国际组织应定期经常性地评估其规章、法律和政策给边缘化群体和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经济安全带来的影响。如不了解这些政策会如何影响这些群体，就不足以从总体上审查国家政策的潜在影响；

(c) 各国和各国际组织应更多地资助开展协作，以增进对世界各地经济不安全的性质和影响的认识，并应广泛传播这类研究的成果；

(d) 在谈判或执行多边贸易协定时，各国应制定并实施全面的贸易调整方案，这些方案应易于续期，可供境内外那些因执行此类协定而被迫(进一步)落入困境的人利用；

(e) 各国制定的经济安全计划需要更好地更新，以考虑到不断变化的工作性质，特别是在共享经济和非正规经济部门工作的人的需要；

(f) 应创建和鼓励可采取国际协作和合作以解决经济安全 and 经济不安全问题平台。国家、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之间的这种合作有助于显著改善全球经济的不安全状况；

(g) 鉴于许多国家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利用现金转移方案，应资助开展具体研究，探讨现金转移方案和刺激方案对改善经济不安全状况的影响；

(h) 应给予全球南方有关国家更多的债务减免，或扩大已有债务减免，以增强它们保障其公民经济安全的能力；

(i) 鉴于当前的 COVID-19 大流行疫情及其经济后果，国际团结行动需要把重点放在改善受影响个人和群体的经济安全上。
